

# 毛澤東對明代歷史文化的吸取和應用\*

翟志成\*\*

## 摘 要

毛澤東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吸取和應用，當然不會僅僅侷限於有明一代。例如清朝曹雪芹的《紅樓夢》、曾國藩的文治武功，對毛思想都產生過重要的影響。要分析論毛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吸取和應用這一課題，必須要有多篇論文甚至多本專書的合力。本文的範圍，只聚焦在毛澤東對明代歷史文化的吸取和應用這一基點上。由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觀念啓發，本文不僅把一切由明人所撰寫和編纂過的文字，均視為明代的史料，而且還把一切由清朝和近現代人所撰寫和編纂的關於明朝的文字，同樣也視為明代的史料。本文的論旨，端在闡析明代的歷史文化，經由毛澤東創造性的轉化之後，已變為毛打天下、治天下或亂天下的重要思想資源。毛的不少方針政策，有些直接緣自毛閱讀與明代相關典籍的心得，有些則經過與毛的閱讀心得互相對照、互相發明或互相批判，從而得到更新、修正或強化。並且，毛對明代小說、戲曲的熟習和靈活應用，使他能如魚得水般自由出入於大眾文化和菁英文化、大傳統和小傳統之間，而他在這兩種文化和兩個傳統之間左右逢源的能耐，又使他成為操弄群眾感情的心理工程大師。他在閱讀《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所領悟出的戰略和戰術，更幫助他在戰場上擊敗了國民黨，贏得了整個中國大陸。

**關鍵詞：**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大眾文化、群眾動員、心理工程

---

\* 拙文在擬稿期間，曾獲香港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的資助(RGC-GRF, No.540211, PolyU 5402/11H)，並蒙陳永發教授、洪長泰教授賜閱初稿並提出修正意見，投稿時又蒙兩位匿名審查人多所指教，真乃受惠良多，端此一併申謝。拙文中的所有錯誤，當然由作者自負全責。收稿日期：2011年9月13日，通過刊登日期：2012年4月6日。

\*\*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 引 言

在一整部中國歷史中，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像毛澤東那樣，三位一體地兼具了上帝（「大救星」）、皇帝（「偉大領袖」）和教主（「偉大導師」）的威望及權勢。在中共立國之後，整個中國大陸，也只有毛澤東一個人，能夠享有思想的絕對自由。而在權力的天平上，只要毛澤東一個人的重量，就足以壓倒黨、政、軍全部重量相加的總和。正因如此，素以「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而顧盼自雄的毛澤東，曾一次又一次地以其個人的意志，強加於黨、政、軍的頭上，逼使正在運轉的歷史車輪突然改變方向，轉入自己重新設定的軌道。1957年「反右」運動之前鼓勵黨外人士批評共產黨的「雙百方針」和「開門整風」，1959年廬山會議上由原定的糾正「大躍進」弊端的「糾左」，突然一變為清算彭德懷的「反右傾」，尤其是由1966年至1976年以清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主要目標的文化大革命，無一不是毛澤東那雙扭轉乾坤的巨手在翻雲覆雨，也無一不是毛澤東以其個人意志，馴服和扭曲了黨、政、軍的集體意志的結果。這種既世俗又神聖、既普遍又超越的毫無限制的權力，若運用在好的方面，便能滌蕩寰宇，摧枯拉朽，澤被天下蒼生；若運用在壞的方面，便會天崩地塌，流血漂杵，賢愚玉石俱焚。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像毛澤東那樣，受到這麼多人的歡呼、擁戴和頂禮膜拜；但也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像毛澤東那樣，受到這麼多人的詛咒、憎惡和切齒痛恨。

由於毛澤東三位一體的最高威望及絕對權勢，他的一靜一動，是喜是怒，甚至連同他經常性的失眠和便秘，都有可能和共和國億萬子民的身家性命息息相關。而在毛澤東之外，又幾乎找不到任何力量，可以限制和約束毛澤東的浪漫意志和無限權力。能限制和約束毛澤東的力量，主要還是來自毛澤東若無若有時斷時續的反求諸己和克己復禮。正因如此，毛澤東在建構自己的思想系統時，主要是從哪些方面吸取思想資源的？而這些思想資源，又如何能在毛澤東打天下、治天下或亂天下時發揮作用？以上的兩個大問號，便成為研究中國當代

歷史尤其是中共黨史的學者必須認真面對和深入反思的課題。

就整體而言，毛澤東思想的精神資源，主要是來自斯大林化的馬列主義和中國的歷史文化這兩大方面。毛澤東至少自認為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王明把毛澤東視為馬列主義的「叛徒」，固然歪曲毛澤東思想的真貌；<sup>1</sup>而海外某些學者把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視為相類於傳統的政治邊緣人、失意文人或不第秀才的聚眾作亂，同樣也不符合中共歷史的實際。毛澤東畢生喜歡讀書，但毛氏除了閱讀馬、恩、列、斯的經典之外，更多的時候，還是用於閱讀中國歷史文化的著作。凡到過毛書房或見過毛書房照片的中外人士，都無不被「革命導師」和「革命領袖」滿屋滿床的古籍和傳統經典所震懾。原來號稱要和「傳統作最徹底的決裂」的共產黨人，竟要擁抱著線裝書才能入夢！毛澤東逝世後，中共把曾被毛澤東圈點畫線或作過眉批的書頁陸續影印出版，其中馬列著作不及十分之一，十居其九全是傳統書籍。這些數量繁多且內容龐雜的批注，可清楚地標示出毛澤東是如何從傳統歷史文化中總結經驗，記取教訓，吸取智慧和激發靈感。終其一生，毛澤東從未中斷過把自己閱讀傳統書籍的所感、所悟和所得，轉化為打天下、治天下或亂天下的技術、方針或政策。職是之故，毛的首席秘書陳伯達，便不能不降尊紆貴，一再向侍隨在毛身邊的機要秘書田家英，探聽毛最近的讀書內容，<sup>2</sup>為日後替毛草擬文件預作準備。

由於毛澤東善於從傳統文化吸取思想資源並以之融會貫通馬列理論，使他和那些只知生吞活剝、死記硬背馬、恩、列、斯教條的中共領導人如王明、博古之流相比，便明顯地分屬於不同類別。王明、博古等為了服從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令，專門削中國現實之足，以適馬列教條之履，曾不止一次把中共革命帶引到毀滅的邊緣；而毛澤東則立足於中共生存和發展的實際需要，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令，或堅決執行、或陽奉陰違、或置若罔聞。毛澤東對蘇俄

<sup>1</sup> 王明，《中共半世紀與叛徒毛澤東》（莫斯科：進步出版社，1979），頁1-3。

<sup>2</sup> 據田家英的老朋友李銳透露：「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翟按：指陳伯達）經常向他打聽『主席最近又讀了什麼書？』『注意什麼問題？』之類。這種察言觀色，探聽氣候以『投其所好』的作風，我們非常反感，也覺得是一種危險之事。」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198。

「老子黨」命令的選擇性接收以及對馬列理論的「活學活用」，甚至使斯大林懷疑他是否「人造奶油式的冒牌共產黨」，然而卻正是他率領著中共，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浴血搏鬥中，擊敗了無論在軍事、經濟和政治力量都要比自己強大得太多的國民黨，一舉奪取了全國政權。在中共官修的黨史中，王明、博古等照例被貶斥為刻舟求劍的「教條主義者」，而毛澤東則被推尊為「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如果剝去政治正確的語言油彩，倒也基本符合事實。毛澤東正是以本土文化融通西來馬列，並應用於打天下、治天下或亂天下的實踐中，既把馬列中國化，同時又把中國馬列化。

要系統而深入地研究毛澤東思想的中西淵源及其在中共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至少需寫好幾十本大書。本文的範圍，只聚焦在毛澤東對明代歷史文化的吸取和應用這一基礎上。本文的注意力首先指向正史。根據搜尋的結果，毛澤東閱讀《明史》只留下六條眉批，閱讀《明史記事本末》留下的眉批也只有七條。這些眉批，絕大部份是毛對戰爭的評點，而且均極簡略，以每條三、四、五個字居多。<sup>3</sup>要撰成一篇學術論文，當然不能只依靠如此單薄的正史資料。由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觀念啟發，本文不僅把一切由明人所撰寫和編纂過的文字，均視為明代的史料，而且還把一切由清朝和近現代人所撰寫和編纂的關於明朝的文字，同樣也視為毛澤東吸收明代知識的史料，藉以考察和剖析毛氏如何把這些史料，經過創造性的轉化之後，變為自己打天下、治天下或亂天下的思想資源。

## 一、三反、發動文革、「鬥私批修」與「深挖洞」

明代歷史文化通過影響毛澤東而予當代中國以最直接、最明顯和最廣泛的影響者，若依照時間順序的編排，首先是中國立國初年的「三反」運動，其次

<sup>3</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283-287、329-335。

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再次是文革早期的「鬥私批修」宣傳，最後是文革後期在全國各大城市的「深挖洞」。

### （一）三反

1944年（甲申）是李自成領導農民暴動大軍攻陷北京的三百週年，郭沫若因之撰寫〈甲申三百年祭〉，全文在《新華日報》連載之後，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下令把該文列入延安整風的學習文件。毛在11月21日致郭沫若函云：「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於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sup>4</sup>毛當時看重郭文的主因，是希望黨內同志吸取李自成敗亡的前車之鑑，千萬不可再因勝而驕。但在1948年底中共立國的前夕，李自成的前車，在毛心中已由「驕傲」轉變為幹部的貪污和腐化。據薄一波回憶：

毛主席又談到了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說，我們不能像李自成進北京，一進城就變了。這個時期，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幾位領導同志多次談到這個問題，有一次，毛主席當著中央和大區的一些同志的面說，新中國快要成立了，我們這些人將來都是要上歷史的，不能像李自成進北京那樣，要約法幾章。這次毛主席又重提這一點，足見面對全國勝利的形勢，怎樣預防黨執政後重蹈李自成式的因勝利而驕傲而腐化的覆轍，已成為他反覆思考的大事。他還向我談了黨內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一定要做到「幾不」，即不做壽、不祝酒、不以人名作地名、活人不上舞台等。毛主席的這些話，不久得到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認可，形成為全黨必須遵守的規定。<sup>5</sup>

1949年3月23日，毛親自率領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及警衛部隊由西柏坡開赴北

<sup>4</sup> 毛澤東，《毛澤東書信手跡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頁39。

<sup>5</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卷上，頁5-6。

平。毛一路上反覆向幹部和戰士叮嚀，一定要在「進京趕考」中考個好成績，絕對不能像李自成考試「不及格」「退回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sup>6</sup>

爲了「決不當李自成」，毛對進城後的中共幹部「中了資產階級的糖衣砲彈」開始貪污腐化的傾向，不僅充滿了警惕，而且還深惡痛絕！共和國成立才剛過兩年，亦即在 1951 年底，毛即大張旗鼓地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隨之又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毛在運動中親自掛帥，硬性規定各級黨、政、軍機關必須按照工作人員總數的百分比，揪出貪污一定數目、人民幣一億圓（相當於今日的人民幣一萬圓）的「大老虎」、一千萬圓的「中老虎」和一百萬圓的「小老虎」，並以撤職、查辦、開除黨籍爲要脅，嚴令中共各級黨政機關的第一把手，必須在限期內按規定的數目把「老虎」交出，並對於執行不力的機關單位動輒通電申斥。爲了向全國宣示自己肅貪的決心，毛不顧黨內的不滿與反彈，拒絕了老同志的求情，親自下令處決了貪污罪行嚴重的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和天津專署專員張子善。薄一波因受了天津市委第一書記黃敬的請托，前來探口風，毛對他說：「正因爲他們兩人（翟按：指張子善和劉青山）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二十個、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sup>7</sup>

毛的「揮淚斬馬謖」，<sup>8</sup>確實收到了殺一儆百的作用。中共各級黨、政、軍機關的第一把手都知道毛這次是認真的，爲了保住自己的黨票和頭上的烏紗帽，他們紛紛私設刑堂，大搞「逼、供、信」，寧可打錯，決不放過，力求「超額完成」毛交辦的「打虎」任務，製造了無數駭人聽聞的假案、冤案和慘案。「三反」和「五反」運動一直持續到 1952 年底才正式宣告結束，據林野王統

<sup>6</sup> 閻長林，《在大決戰的日子裡》（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頁 225。

<sup>7</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卷上，頁 152。

<sup>8</sup> 毛曾爲處決劉青山、張子善的決定自辯：「非殺不可。揮淚斬馬謖，這是萬不得已的事情。」收入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頁 172。



計，在歷時一年的運動中，全國共有 184,270 人被捕，119,355 名中共黨員被開除黨籍，133,760 人「非正常死亡或傷殘」。所謂「非正常死亡」，意指在鬥爭會上或刑訊逼供中被打死，或被迫自殺，或在監獄、勞改場中被折磨致死。<sup>9</sup>

## （二）發動文革

眾所周知，文革的風暴是由姚文元撰文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引爆的。關於姚文元製作的經過，據毛在 1967 年 2 月 3 日向訪華的「外國朋友」希斯尼·卡博和貝爾基·巴盧庫透露：「這場鬥爭也準備了一個時期。前年十一月，對一個歷史學家吳晗發表了一篇批判文章。這篇文章在北京寫不行，不能組織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們搞了一個班子，寫出這篇文章。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先告訴我要批評。他們在北京組織不了，到上海去組織，我都不知道。文章寫好了交給我，說這篇文章只給你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sup>10</sup>毛所謂「開頭寫我也不知道」當然不可能是真的，但姚文元在發表前，連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彭真、康生和陸定一都被蒙在鼓裡，卻一點都不假。毛指使江青到上海秘密炮製以姚文元署名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無非是要為文革的發動尋找一個突破口；而毛一意要把吳晗推出來祭旗，又緣於認定了吳晗的《海瑞罷官》，意在指桑罵槐，借古諷今，替在廬山會議上被自己罷了官的彭德懷元帥翻案。1965 年 12 月 21 日，毛在杭州對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峰等文學侍從表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五九年

<sup>9</sup> 〈「三反五反」抓捕 18 萬：死傷者多達 13 萬〉，<http://history.news.163.com/08/0407/08/48TQ3FLT00011247.html> (2008/4/7)。

<sup>10</sup> 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冊下，頁 1397。

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sup>11</sup>

1959年廬山罷彭德懷的官，很可能是毛在建國後最大的一塊心病。因為，緊隨著會議後連續三年的大饑荒，全國各地人相食，餓殍四千萬的嚴酷現實，已證明了彭德懷的諫言，不僅完全正確，而且純粹是出於為民請命的一片赤膽忠心；並且，也同時證明了毛把彭德懷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頭子，是徹頭徹尾的誣陷。但毛為了維護自己在黨國的絕對權威，不僅拒絕了彭德懷平反冤獄的請求，反而再以莫須有的罪名，進一步構陷彭「裡通外國」，並把彭放逐到大西南。毛是個洞明世事、人情練達而又聰明絕頂之人，他明知自己理虧，明知公道自在人心，明知自己這種倒行逆施誣陷忠良的做法，會引起民心、黨心和軍心的極大不平。正由於心中懷著鬼胎，毛對一切有可能類推或想像到廬山會議和彭德懷的言語文字，都不免杯弓蛇影，疑神疑鬼。劉少奇本是毛指定的接班人，就連他在「七千人大會」上隨口說了句三年饑荒實緣於「七分人禍，三分天災」的大實話，都會讓毛惱羞成怒而暗下鏟除之心，而吳晗的《海瑞罷官》又怎能不令毛生疑？嘉靖皇帝本極易讓滿腦子帝王思想的毛澤東「對號入座」，而曾經當過兵部尚書的海瑞，又極易讓毛斷定是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分身。儘管吳晗自我撇清的答辯，曾讓毛「一夜無眠」。<sup>12</sup>但毛經過「一夜」的反思之後，仍一口咬定吳晗確實是替彭德懷翻案。因為，從時間的先後順序看，毛

<sup>11</sup> 當時戚本禹發表了〈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指名批判翦伯贊等人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與姚文元並列，成為史壇雙「左」。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冊下，頁1400-1401。

<sup>12</sup> 1965年底光明日報編印的《情況簡編》，其中一期輯有吳晗的自辯，另一期輯有翦伯贊的評論，引起了毛的特別留意。據《毛澤東傳》的作者引述：「一期是〈吳晗看了姚文元批評《海瑞罷官》一文後的反映〉，裡面講到吳晗在十一月十四日說：『姚文元說我的《海瑞罷官》作品產生於一九六一年『刮風』的時候。這是錯了。我的〈論海瑞〉發表於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日的《人民日報》上。《海瑞罷官》是一九六〇年寫的，我沒有那麼大的本領預見到一九六一年要『刮風』。』他表示：不準備寫答辯的文章，正給市委寫個報告，直接送給彭真同志。還說：『姚文元這樣批評我，我也不怕。不過我覺得這樣牽強附會的批評，亂扣帽子，這種風氣很不好，誰還敢寫東西，誰還敢寫歷史？』毛澤東看了這篇材料後批道：『我都已看過，一夜無眠。』另一期是〈關於姚文元評《海瑞罷官》文章反應續聞〉，裡面說：『翦伯贊認為，現在學術界的顧慮並未解除，姚文元亂來一通，不利於百家爭鳴。』毛澤東看後在旁邊畫了三個圈。到上海後，他得知北京各報沒有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將這篇文章印成單行本，向全國發行。」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冊下，頁1398-1399。



的「一夜無眠」約在 1965 年 11 月下旬，但他指斥《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的談話，卻發表在 1965 年 12 月 21 日。爲什麼毛對吳晗的自辯不予採信呢？因爲，吳晗的《海瑞罷官》撰寫於 1960 年，而「刮風」卻發生在 1961 年，雖能證實《海瑞罷官》與 1961 年在全國刮起的「黑暗風」、「翻案風」和「單幹風」無關，證實姚文元把《海瑞罷官》與「刮風」勾連是「牽強附會」和「亂扣帽子」，但卻絲毫不能證實《海瑞罷官》和彭德懷的「罷官」無關。而彭德懷的「罷官」是發生在 1959 年的「鐵一般」的事實，使得吳晗以時序爲訴求的辯護策略，不僅不能釋毛之疑，反而越描越黑。

吳晗所撰寫〈論海瑞〉、〈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等一系列文章和戲劇的目的，不僅不是爲了批毛，而是爲了向毛希幸邀寵，究其實都是一些不折不扣的「遵命文學」。據目下的史料披露，毛在 1959 年 4 月上旬在上海觀看湘劇《生死碑》，對劇中的海瑞心有戚戚焉，因對下屬說：

海瑞這個人對皇帝罵得很厲害，罵嘉靖是「家家皆淨」，還把這話寫在給皇帝的上疏裡。以後被送進監獄。有一天，看監人忽然拿酒菜給他吃，他很奇怪，便問看監的老頭，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儘管海瑞攻擊皇帝很厲害，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要宣傳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找幾個歷史學家研究一下。<sup>13</sup>

當毛的文膽胡喬木果真把毛的意旨找明史專家吳晗「研究一下」時，吳晗以極大的熱情和幹勁，遵循毛定下的基調，撰寫了一系列戲文，卯足全力地「宣傳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但吳晗萬萬沒想到的是，毛對海瑞的肯定和讚美，只不過是葉公好龍。當「海瑞」的分身真的在廬山會議上出現時，毛對海瑞的感情便不免出現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用毛自己的話：「我希望中國能多出幾個海瑞。……講海瑞，我很後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邊多年的戰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講話。」<sup>14</sup>毛內心的微妙變化，並沒有公

<sup>13</sup> 黃麗鏞編著，《毛澤東讀古書實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 261。

<sup>14</sup> 黃麗鏞編著，《毛澤東讀古書實錄》，頁 262。

諸於世，而吳晗又不是劉少奇，並沒有毛「身邊多年的戰友」的體會，他哪會知道，他每在「宣傳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上多花一分力氣，就等於在挖掘自己的墳墓時多刨了一畝土。吳晗在文革中最先被揪出來，真正成了「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全民公敵。

吳晗雖懷抱著如天般大如海般深的冤屈含恨死去，但他亦或有取死之道。吳晗在 1948 年底初遇毛澤東，呈上《朱元璋傳》的書稿。此稿是吳晗在 1944 年 6 月已刊的「少作」《明太祖傳》的增訂本，原旨是「指桑罵槐」，「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sup>15</sup>毛在通讀書稿後，專門約見吳晗，以後又再修函致意，毛所提出的「不成熟的意見」（亦即吳晗自承的「嚴重錯誤」），主要集中在吳晗「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sup>16</sup>以及「給歷史上較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過分的斥責」。<sup>17</sup>吳晗是當時頗負盛名的明史權威學者，而毛則連明史的門檻也未曾進入。若站在學術的專業立場，吳晗對毛「不成熟的意見」，一笑置之可也。但吳晗畢竟用世之心腸太過熾熱，對毛的意見如聞鈞天如奉聖旨，他來不及阻止書稿的出版，「便決意重寫，改正錯誤」，遵循毛的意旨寫出了第三本書稿。吳晗完稿之後，為慎重起見，先油印一百多本廣泛徵求各方意見，繼因「第三個本子的主要缺點和錯誤，是對階級關係、階級矛盾、階級分析注意不夠，對朱元璋這個歷史人物的評價也不夠全面」，<sup>18</sup>於是又重新撰寫出「第四個本子」。本來，學術權威和政治權威，各自有其的領域和邊界，其權威也只有在屬於自己領域的範圍之內，才會確當而有效。毛對吳晗的批評，本是無效的，甚至是「無厘頭」的越界，而吳晗對毛越界的照

<sup>15</sup> 吳晗，《朱元璋傳·自序》（北京：三聯書店，1965），頁 iii。

<sup>16</sup> 毛澤東於 1948 年 11 月 24 日致吳晗信云：「辰伯先生：兩次晤談，甚快。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力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啓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謹致革命的敬禮！毛澤東 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 310。

<sup>17</sup> 吳晗，《朱元璋傳·自序》，頁 iii。

<sup>18</sup> 吳晗，《朱元璋傳·自序》，頁 iii-iv。

單全收，則象徵著學術對政治的無條件投降。「學術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本是共和國的鐵律，而為政治服務的奴婢，當權者也只會以倡優蓄之，決不可能給予任何的信任和尊重。如果以扭曲學術來服務政治，已成了共和國學者的生存之道，我們又有何理由要求當權者尊重學術和信任學者？以毛與吳晗之事而論，既然朱元璋的歷史，在吳晗手裏如麵糰一般充滿可塑性，既可被用來「影射蔣介石」，又可被用來稱美革命領袖，為什麼嘉靖皇帝和海瑞，就一定不可能被吳晗用來附會毛和彭德懷？更何況毛對廬山會議後的悠悠眾口，內心一直充滿了焦慮、猜疑和畏懼！吳晗撰寫的《海瑞罷官》，當然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產生的最主要原因，甚至不是其主要原因；但長達十年的文革浩劫，畢竟因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而引爆。至於文革期間鬼哭神嚎、生靈塗炭、是非顛倒、人倫扭曲，被迫害人數超過一億，學界和文化界已有足夠多的論述，於此從略。

### （三）「鬥私批修」

毛澤東之所以能動員億萬群眾加入文革造反大軍的行列，所憑藉的無非是挑激起人民對中共立國十七年來的極權統治的憎惡和怨恨。雖然毛竭力把極權統治所衍生的種種弊端，歸咎於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歸咎於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群眾卻借揪鬥「走資派」和批判「資反線」之名，揪鬥了中共從中央到地方幾乎所有的各級領導幹部，攻擊了中共立國十七年來幾乎所有的政策——儘管他們的手中仍高舉著「紅彤彤」的毛語錄，儘管他們的口中仍高呼著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億萬群眾正是藉著「奉旨造反」，盡情地宣洩了他們對極權政治的入骨憎惡和怨恨。如果說，毛在文革中蓄意地利用了群眾；那麼，群眾也同樣在文革中有意或無意地利用了毛澤東。<sup>19</sup>

中共在立國之後，本來就是通過少數的基層的黨員、團員和積極分子操縱

<sup>19</sup> 劉國凱編，《封殺不了的歷史》（紐約：《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叢書》編輯部，1996），頁 3-56。

和控制多數的群眾，久而久之，黨員、團員和積極分子便成了治人者和整人者，而群眾則成了治於人者和被整者。當奉旨造反的群眾把批判鬥爭的矛頭指向「走資派」，亦即黨員、團員和積極分子的靠山時，黨員、團員和積極分子自然要挺身而出，在捍衛黨的名義下捍衛自己的靠山，捍衛自己繼續治人和整人的特權和優越的社會地位；而「走資派」也亟需由黨員、團員和積極分子組成的群眾組織，作為自己的護官符、護身符和擋箭牌，以削弱或抵消群眾批鬥的火力。這些「走資派」的衛隊，在文革時又被稱之為保皇派或保守派，而攻擊「走資派」們群眾則被稱之為造反派。文革時共和國幾乎所有的政府部門、機關、學校、工廠和企業，都並存著勢不兩立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和保守派在文革前的舊恨未消，在文革時又添新怨，正所謂「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彼此的一交手即殺得難分難解；由口舌文宣的文鬥，很快便演成了拳腳交加的武鬥；武鬥的規模，也由單位擴大到市，由市擴大到省；而武鬥的器械，也由冷兵器迅速升級為熱兵器，由長矛大刀很快換成了機槍火炮……。

造反和保守兩派群眾組織的全面廝殺，著實干擾了毛由下而上任由群眾「火燒」和「砲轟」中共的當權派，藉由「革命大批判」的烈火以甄別當權派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偉大戰略部署」。毛曾多次以「抓革命、促生產」、「復課鬧革命」、「聯合奪權」等政策，竭力要弭平造反和保守兩派群眾組織的矛盾和對立，共同把批判和鬥爭的矛頭再次指向「走資派」。「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諸如此類的話語，毛在1967年7月來到武漢時，曾對被中央文革封為「造反派」的「工人總部」和被貶為「保守派」的「百萬雄師」同時表達過；毛在同年8月來到上海時，也對「造反派」的「工總司」和「保守派」的「聯司」和「支聯站」同時表達過。儘管毛上述的講話被新華社奉為「極其重要的指示」正式向全國公布，<sup>20</sup>被翻

<sup>20</sup> 見人民日報1967.09.25第1版，新華社9月24日的電訊：〈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近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調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本文來源於人民數據庫，網址：<http://data.people.com.cn>）。

印成中央文件責令全國學習，<sup>21</sup>被譜成語錄歌在各地傳唱，<sup>22</sup>但「造反」和「保守」兩大派群眾組織的「勢不兩立」卻依然如故。儘管兩大派群眾組織都一齊高舉著「誓死保衛毛主席」和「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大纛，但卻任由毛把「大聯合」的調子唱得舌乾唇焦，卻依然纏鬥廝殺不止。毛的每一句話，在文革時曾被全國上下奉為「最高指示」，號稱有「一句頂一萬句」的神效；但如今毛的苦口婆心循循誘導，卻如同泥牛入海，結果說了一萬句還真頂不了一句！儘管毛表面上把「最高指示」的失靈，歸咎於「走資派」對群眾的「蒙蔽」和「挑撥」，<sup>23</sup>但在他的內心深處，卻認定了群眾兩大派之所以無法「大聯合」的更真實和更深層原因，端在於兩派群眾都「唯我獨左」和「唯我獨革」（自命為最「左」和最「革命」），都只會攻擊對方和抬高自己，都在堅持「大聯合」只能「以我為核心」，否則一切免談……。<sup>24</sup>而群眾的這些「既驕且吝」和自伐自誇的行徑，看在毛的眼裡，無疑是受了「私心雜念」的污染和影響所致。

毛在童蒙時便在鄉塾把朱熹編注的《四書》背誦得爛熟，他在青春期貨筴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時，又為踐履充滿宋明理學情調的「修身」而追隨過教師楊昌濟。儘管毛投身共產革命之後，曾不止一次地表示過對儒家學說的輕蔑和鄙夷，在文革後期更發動過全國規模的「批孔揚秦」和「批林批孔」運動，但童蒙和青春期的漫長薰習浸潤，畢竟非同小可，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學價值系統和思維模式的一些枝枝葉葉或斷簡殘篇，早已融入了毛的靈魂血肉和骨髓之中，成了他名副其實的負骨之疽。和他那些曾因舉業而飽讀過經書的反傳統前輩如陳獨秀、魯迅和胡適等人一樣，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學離魂游魂的糾纏，成了毛

<sup>21</sup> 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下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67年7月-10月》（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冊12，頁385-386。

<sup>22</sup> 〈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http://www.oldmusic.com.cn/play/1119.html> (2008/8/17)。

<sup>23</sup> 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67年7月-10月》，冊12，頁386。

<sup>24</sup> 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67年7月-10月》，冊12，頁386。



終其一生揮之不去的夢魘。毛最起勁弘揚的是「革命意志」、「獻身精神」和「主觀能動性」，最愛聽的是「革命第一」和「人的因素第一」，最討厭的是「物質刺激」和「獎金掛帥」，最愛搞的是五花八門的思想改造運動，最愛唱的是「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所有這些，都可以在宋明理學家的「自作主宰」、「先立其大」、「正其誼不謀其利」、「人皆可為堯舜」等日常話語中找到思想的淵源。

我們知道，宋明理學家無論各家各派，都把人的私慾視為萬惡之源，把「滅私存公」視為弘道救世包醫百病的萬靈丹，<sup>25</sup>毛為了清除「私心雜念」對億萬信眾的汙染和影響，轉而向宋明理學的思想武庫乞援，乃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1967年10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鬥私批修」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針〉，正式把毛「要鬥私批修」的「偉大號召」向全國公告。<sup>26</sup>10月12日，《人民日報》再次發表社論〈全國都來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要求全國的工廠、機關、學校、部隊和農村，都一律要以「鬥私批修」為主題舉辦學習班。<sup>27</sup>11月6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以〈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為題，聯名發表編輯部文章。<sup>28</sup>這篇經過毛親筆修改過的重要文章，其核心宗旨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所謂「鬥私」，就是要求每個人都在「靈魂深處鬧革命」，力求「破私立公」，這和宋明理學家念念不忘的「滅私存公」，可謂若合符契。宋明理學家無不把「私」視為萬惡之源，毛也是如此。毛最痛恨蘇聯赫魯曉夫一類的「修正主義者」，因而把「蘇修」或「修」視為萬惡的

<sup>25</sup> 詳參翟志成，〈宋明理學的公私之辨及其現代意涵〉，收入黃克武、張哲嘉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1-57。

<sup>26</sup> 《人民日報》1967.10.06第2版：〈「鬥私批修」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針〉（本文來源於人民數據庫，網址：<http://data.people.com.cn>）。

<sup>27</sup> 人民日報1967.10.12第1版：〈全國都來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本文來源於人民數據庫，網址：<http://data.people.com.cn>）。

<sup>28</sup> 作者：《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人民日報》1967.11.06第1版：〈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週年〉（本文來源於人民數據庫，網址：<http://data.people.com.cn>）。



代名詞。因為有「私」，就必然會變「修」；若然無「私」則亦必無「修」。在毛的強勢主導之下，中國億萬群眾被圈入各地的工廠、機關、學校、部隊和農村的「毛澤東思想學習」中，每人都被要求當眾現身說法，舉出實例闡明自己過去是如何因為「私」而墮落到「修正主義者」的邊緣，如今通過了學習毛著，「狠鬥私字一念閃」，終於幡然悔悟，迷途知返云云……。

和毛澤東一樣，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學當然也十分強調個人對「私慾」的克治省察，以及對過錯衍尤的自省和悔悟；《大學》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sup>29</sup>《中庸》亦云：「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sup>30</sup>這些都是國人耳熟能詳的格言。但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學家強調對「私慾」的克治以及對過錯的懺悔，其力量的源泉主要是個人「依自不依他」的良知的真正自覺，究其實是自內而非外，由己而非從人，<sup>31</sup>這和毛澤東主要依靠單位和組織的強制，再加上群眾大會小會批判、砲轟、火燒的壓力，大搞「人人過關」，強迫每個人違心地檢討認罪的作為大相逕庭。「鬥私批修」運動一直延伸到 1970 年代初期，毛依靠外部的強制和壓力，逼迫每個人在學習班中「鬥私批修」，結果卻演成了全國性的假話、大話和空話的大車拚，幾乎每個人都曾為了「過關」而加入了弄虛作假的行列。<sup>32</sup>《中庸》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sup>33</sup>毛的「鬥私批修」，正是以徹底敗壞了國人的心術，來證明《中庸》「不誠無物」之所言不虛。這恐怕是「鬥私批修」運動留給國人唯一的一點正面價值——如果不是全無價值的話。

<sup>29</sup>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7。

<sup>30</sup>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頁 17。

<sup>31</sup> 王艮〈樂學歌〉云：「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明]王艮，《王心齋全集》（台北：廣文書局，據日本嘉永元年科本影印，1987），卷 4，〈樂學歌〉，頁 5b。

<sup>32</sup> 其中例證可參考當事人的回憶：辛向黨，〈憶當年的「鬥私批修」〉，<http://smbk.hebnews.cn/?223431>；佚名，〈狠鬥私字一念閃〉，<http://lengyanzushi.blogbus.com/logs/8080053.html> (2007/9/3)。

<sup>33</sup>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頁 34。

#### （四）「深挖洞」

文革期間還有另一件勞民傷財的大事，同樣和毛的閱讀明史脫不了干係。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轉發國務院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時，寫下了這樣的批語：「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當前國內外形勢大好，各級領導同志要謙虛謹慎，不要因為勝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講了《明史·朱升傳》的歷史故事。明朝建國以前，朱元璋召見一位叫朱升的知識分子，問他在當時形勢下應當怎麼辦。朱升說：『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朱元璋採納了他的意見，取得了勝利。根據我們現在所處的國內外大好形勢和我們所堅守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立場，毛主席說：我們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毛主席的這一指示，使『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方針更加具體化了。」<sup>34</sup>毛在文革期間，竭力向全世界輸出革命，左批修正主義，右鬥帝國主義，四面樹敵。毛經常想像著美帝和蘇修的聯手武裝入侵，因而提出「備戰、備荒」和「全民皆兵」的戰略與之針鋒相對。至於應該如何「備戰」，如何「備荒」，毛在《明史·朱升傳》中找到了靈感：既然朱元璋因聽從了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九字訣，打下了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江山，毛於是把朱升的九字訣改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作為「備戰、備荒」的具體做法——「不稱霸」與「緩稱王」，異曲而同工，都是為了後發先至，制人而不受制於人；「廣積糧」則同為古今「備戰、備荒」所必須，故可一字不漏照單全抄；但「高築牆」在現代戰爭中等於自尋死路，故變更為「深挖洞」，既可躲避空襲的炸彈，又可在強敵佔領地面時在地底組織反攻。——在毛一聲令下，全國各城市大張旗鼓地開展了「深挖洞」的地下土工作業。只不過美帝和蘇修至今仍未見前來入侵，而毛的「靈感」的不幸「失靈」，除了無窮無盡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被白白浪費了之外，還在各城市的地底，留下了無數藏污納垢的坑道，無數衛生和治安的毒瘤和死角。

<sup>34</sup>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冊下，頁1623-1624。

## 二、「心理工程」

毛澤東接觸得最早，最喜愛也讀得最熟的，是明清的章回小說。他在 1936 年接受美國記者斯諾專訪時，就把童蒙時偷偷閱讀「禁書」的經驗，描繪得活靈活現：

我熟讀經書，可是不喜歡它們。我愛看的是中國舊小說，特別是關於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時候，儘管老師嚴加防範，還是讀了《精忠傳》、《水滸傳》、《隋唐》、《三國》和《西遊記》。這位老先生討厭這些禁書，說它們是壞書。我常常在學堂裡讀這些書，老師走過來的時候就用一本正經書遮住。大多數同學也都是這樣做的。許多故事，我們幾乎背得出，而且反覆討論了許多次。關於這些故事，我們比村裡的老人知道得還要多些。他們也喜歡這些故事，常常和我們互相講述。我認為這些書大概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齡裡讀的。<sup>35</sup>

毛澤東向斯諾提及的五本書，除了《精忠傳》（即《精忠演義說本岳王全傳》，簡稱《說岳全傳》）與《隋唐》（即《隋唐演義》）分別為清人錢彩和褚人獲所撰之外，其餘《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三國》（即《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以及《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都是明朝人。毛澤東「在易受感染的年齡裡讀的」明人小說，當然遠不止這區區三本。曾經毛澤東之口的明代小說，就目前所知，至少還有元明年間為無名氏所撰的神話小說《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明吳元泰的《八仙出處東遊記傳》，尤其是明許仲琳（或陸西星）的《封神演義》。此外，為今人所撰寫的關於闖王李自成的長篇小說，則有李健侯的《永昌演義》、姚雪垠的《李自成》，特別受到毛氏的青眼。毛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時，就曾修函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拜託李代邀李健侯到「延安一游」。<sup>36</sup>毛在革命成功之日，更透過原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時

<sup>35</sup>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 108。

<sup>36</sup> 毛澤東 1944 年 4 月 29 日函云：「鼎銘老先生左右：《永昌演義》前數年為多人所借閱；近日鄙人閱讀一過，獲益良多。並已抄存一部，以為將來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經營此書，費了大力，請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書讚美李自成個人品德，但貶抑其整個運動。實則吾

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下令中共武漢市委在文革的漫天烽火中對姚雪垠「加以保護」。<sup>37</sup>

除了愛看小說之外，毛澤東還是一個中國傳統戲劇的戲迷。早在延安時期，毛的窯洞中翻來覆去播放的，大都是梅蘭芳等京劇紅伶的唱片。到北京去看梅郎的戲，曾是毛革命奮鬥的重要原動力之一。毛打天下成功之後，中南海夜夜笙歌不斷，凡是全國各傳統劇種的名角，當然包括梅蘭芳、俞振飛、馬連良、蓋叫天、周信芳等等戲劇表演大師，都不止一次擁有御前演出的殊榮。<sup>38</sup>即使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業已被全部趕出舞臺，八億多人口的中國，文革十年只許觀看由江青一手炮製的八個「樣版戲」，而文化部長于會泳卻必須親自領軍，集結了被逼轉業甚至「上山下鄉」的全國各傳統劇種的優秀青年演員，在一個與世隔絕的秘密場所大演特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毒草戲」，為的是製成錄像帶後送到毛的病床前，專門讓毛一個人過足戲癮。<sup>39</sup>

由於文獻不足徵，現在已無法偵知那些在當時中國大陸被禁絕的傳統戲曲，曾給這個纏綿病榻的垂死獨裁者，帶來多大的精神慰藉。但從中國傳統小說與戲曲的傳承和共生的緊密關係來看，可以肯定的是，毛在病榻上觀賞的戲曲，連同他在生病之前觀賞的，有相當多的成分改編自明代的小說，尤其是《水滸傳》、《三國演義》和《西遊記》。中國傳統社會中的菁英文化和大眾文化

---

國自秦以來二千餘年推動社會向前進步者主要的是農民戰爭，大順帝李自成將軍所領導的偉大的農民戰爭，就是二千年來幾十次這類戰爭中的極著名的一次。這個運動起自陝北，實為陝人的光榮，尤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們的光榮。此書現在如按上述新歷史觀點加以改造，極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獲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來健康如何，能來延安一游否？統祈轉致健侯先生為禱！敬頌 大安 毛澤東 四月二十九日」轉引自吳江雄編，《毛澤東談古論今》（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卷上，頁 392-393。

<sup>37</sup> 毛澤東在 1966 年 7-8 月間給王任重的指示中提及：「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上冊，我已看完，寫得很不錯，你通知武漢市委，要對姚雪垠加以保護，讓他把書寫完。」轉引自吳江雄編，《毛澤東談古論今》，卷上，頁 393。

<sup>38</sup> 例如，報人徐鑄成為第一屆全國政協代表，於 1949 年 10 月 4 日開會期間受邀到中南海懷仁堂觀劇，當晚演出的戲目即有譚富英的《定軍山》和梅蘭芳的《宙宇錄》。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頁 207。

<sup>39</sup> 岳美緹，〈謎一般的日子〉，收入氏著，《昆曲五十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頁 139-153。

區隔，以及大傳統與小傳統的濠溝，遠不如西方社會那麼壁壘森嚴，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中國有小說和戲曲，作為溝通兩種文化和兩個傳統的重要中介。但當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由洋學堂讀洋書培養出來的洋學生，普遍地拋棄了傳統而擁抱西方，因而也普遍地缺乏了和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工、農、兵群眾交流情感及溝通思想的共同語言，從而造成了他們在小傳統和大眾文化場域「失語」兼「消音」的欲振乏力。毛澤東對傳統小說戲曲的酷愛和熟悉，使他和小傳統大眾有了共同的語言，有了分享感情的共同心理基礎，因而總能出入於兩種文化和兩個傳統之間而左右逢源如魚得水。毛這種善於和下層社會打成一片的特殊賦稟，讓他處身於即使是以小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中共高層中，也顯得如此的鶴立雞群。張國燾曾以充滿忌恨的複雜感情，談到毛善於結交「三教九流」的種種手腕。雖然他是意在譏笑毛所行使的「江湖手段」，實在辱沒了共產黨員的品格和身分；但他也不得不承認，毛的作為在客觀上有利於中共的壯大和發展，不得不承認中共整個高層包括自己在內，無一人有毛這種能耐和本領。<sup>40</sup>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 Elizabeth J. Perry，把毛澤東有計畫有系統地挑動和操弄群眾感情的心理工程(psychological engineering)，視為中共革命之所以能成功的重要因素；<sup>41</sup>而香港科技大學歷史學教授洪長泰，更具體呈現並深入剖析了毛澤東如何在空間政治和物質文化等層面，有計畫有系統地推行其挑動和操弄群眾感情的心理工程。<sup>42</sup>

毛澤東打天下時的追隨者，絕大部份是在黃土地刨食的農民，以及穿上軍裝的農民。大傳統士紳向小傳統農人教忠教孝的媒介，無非是鄉土說書人口中的傳奇故事，以及江湖戲班在草棚中的即興演繹。明代小說和戲曲中的各式人等，如關雲長、趙子龍、諸葛亮、曹操、孫悟空、豬八戒、白骨精、林冲、武松、魯智深、扈三娘，以及張果老、姜子牙、申公豹、千里眼、順風耳……等

<sup>40</sup> 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1971-1974），冊3，頁1235。

<sup>41</sup> Elizabeth J. Perry, "Moving the Mass: 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7:2 (June 2002), pp. 111-128.

<sup>42</sup> Chang-tai Hung,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126.



等，無一不是跟隨毛澤東鬧革命的農民和士兵耳熟能詳喜聞樂見的人物典型；而毛澤東卻可以不費吹灰之力，隨時隨地把這些「英雄」和「牛鬼蛇神」及其精彩故事信手拈來，一變為說服、教育、表揚和鼓動群眾的最佳範例。爲了鼓舞軍心士氣，毛把開關五臺山根據地的晉察冀軍區司令聶榮臻，比作《水滸傳》大鬧五臺山的魯智深，<sup>43</sup>誇獎「橫刀立馬」的「彭（德懷）大將軍」，勝過《三國演義》中過五關斬六將的關雲長，而自己的貼身衛隊，則人人都比曹操手下第一勇將許褚還要厲害。<sup>44</sup>爲了激勵黨徒們幹革命奮不顧身，毛特別號召大家效法《水滸傳》裡的拚命三郎石秀；<sup>45</sup>當八路軍新四軍要深入敵後打游擊時，毛則把自己比作《封神榜》中的元始天尊，送給部隊「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這三件法寶，<sup>46</sup>並指示部隊一定要化整爲零，像孫行者般鑽進鐵扇公主的心臟裡克敵制勝。<sup>47</sup>毛澤東即使在行軍打仗之時，也常借助小說戲曲人物的現身說法，向部眾闡明自己的意圖。有一次他想利用早晨的濃霧發動進攻，便對朱德說：「總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國時，諸葛亮借

<sup>43</sup> 毛曾當面誇聶：「五臺山，前有魯智深，今有聶榮臻，聶榮臻就是新的魯智深。」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5），頁 487。

<sup>44</sup> 毛說：「《三國演義》算我讀到的第一本軍事教科書吧，可也受了一點騙，許褚好像不得了，現在發覺算不了什麼。我們警衛排的戰士都是種田的農民，我看哪個都比許褚厲害。關雲長就不如我們彭老總！」權延赤，《衛士長談毛澤東》（台北：李敖出版社，1990），頁 190。

<sup>45</sup> 毛說：「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麼叫拚命？《水滸傳》上有那麼一位，叫拚命三郎石秀，就是那個『拚命』。我們從前幹革命，就是有一種拚命精神。」毛澤東，〈堅持艱苦奮鬥，密切聯繫群眾〉，收入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下略），《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卷 5，頁 420。

<sup>46</sup> 毛說：「當年姜子牙下崑崙山，元始天尊贈了他杏黃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樣法寶。現在你們出發上前線，我也贈給你們三樣法寶，這就是：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海魯德等編著，《生活中的毛澤東》（北京：華齡出版社，1989），頁 66。

<sup>47</sup> 毛說：「何以對敵人的龐大機構呢？那就有孫行者對付鐵扇公主爲例。鐵扇公主雖然是一個很厲害的妖精，孫行者卻化爲一個小蟲鑽進鐵扇公主的心臟裡去把她戰敗了。柳宗元曾經描寫過的『黔驢之技』，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一個龐然大物的驢子跑進貴州去了，貴州的小老虎見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後來，大驢子還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孫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辦法對付這個日本妖精或日本驢子的。目前我們須得變一變，把我們的身體變得小些，但是變得更加紮實些，我們就會變成無敵的了。」毛澤東，〈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收入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卷 3，頁 882-883。



東風大破曹兵。今天，我們借晨霧全殲頑敵啊！」<sup>48</sup>又有一次他生怕在敵方火力偵察時暴露了目標，便指示部隊：「敵人打冷槍，說明是在搜集情況，我們就暫且裝聾賣啞，要記住，今晚只唱『借東風』，可不能唱『草船借箭』囉！」<sup>49</sup>毛指揮分散在全國各地部隊作戰，當然離不開電臺，故電臺收發人員的伙食和薪酬，在共軍中一直是最優厚的；毛澤東封他們為《封神榜》裡的「千里眼」和「順風耳」，為革命事業所必不可少，<sup>50</sup>如此一來毛特別批給他們的特殊待遇，在號稱「經濟平等」的紅軍指戰員中，也就再沒人敢質疑了。

在打天下的奪權鬥爭中，必須時時刻刻在追隨者的靈魂深處，強化其「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sup>51</sup>的堅強意志，以及向他們指示鬥爭的正確方向。毛澤東為此特別表揚了《西遊記》中唐僧所乘的那匹白龍馬：「你們別小看了那匹小白龍馬，它不圖名，不為利，埋頭苦幹，把唐僧一直馱到西天，把經取了回來。我們一個革命者做事情，好比挑擔子，有六十斤的，有一百斤的，只能揀一百斤的挑，不能揀六十斤的挑。這是一種樸素、踏實的作風，我們都要樹立這種作風。」<sup>52</sup>但是，僅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是不足夠的。因為，策略和路線的正確與否，會直接影響到打天下的成敗。毛澤東在強調「方向」和「作風」的同時，也時時強調「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sup>53</sup>為了引起追隨者對策略和路線的高度警惕，毛甚至請出

<sup>48</sup> 張健、劉慶華等編著，《毛澤東的軍事藝術》（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頁149。

<sup>49</sup> 許祖范、姚佩蓮、胡東編著，《毛澤東幽默趣談》（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頁149。

<sup>50</sup> 毛對電臺收發人員說：「做任何工作，都應該知道他的重要性，你們是革命的『千里眼』、『順風耳』，紅軍缺少電台，就好像缺少了魯班石一樣啊！」劉泮林，〈要做革命的「魯班石」〉，收入人民出版社編，《偉大的歷程——回憶戰爭年代的毛主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148。

<sup>51</sup> 194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七大」所做的閉幕詞中指出：「我們宣傳大會的路線，就是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從此，「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在軍中廣為流傳。文革時還被譜成「語錄歌」，在赤縣神州家喻戶曉，億萬人同聲歌唱。

<sup>52</sup> 牛克倫，〈鎔爐〉，收入中國人民大學附屬簡報資料圖書卡片社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革命回憶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附屬剪報資料社圖書卡片社，1965），頁42。

<sup>53</sup> 毛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這三條，再加上「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八個字，被歸納總結成「三八作風」，成了共軍必須時刻學習的「傳家寶」，同樣在文革時被譜成了億萬人傳唱的「語錄歌」。

了八仙中的張果老：據「解放後」官拜上將的蕭克回憶：

一次，毛澤東引用一個神話故事作比喻，生動地說明了路線和政策的  
重要，他說：張果老下華山，去蓬萊朝聖，這個人不是凡人，是個仙  
家啊！他騎毛驢，和我們不同，是倒騎的。走著，走著，遇到了呂洞  
賓，傳說呂洞賓也成了仙啊！問張果老到哪裡去？張說：「上蓬萊朝  
聖。」呂洞賓有點驚異地問：「蓬萊在東，你騎毛驢向西，怎麼得到？」  
張果老生氣了，認為自己有理，反駁道：「我的臉是朝著東方的蓬萊  
的啊！」毛澤東講完故事後說：即使革命的人，如果路線政策不對，  
革命還是不能勝利。張果老雖然面向蓬萊，路走錯了，永遠也到不了  
蓬萊。<sup>54</sup>

郭沫若曾與毛澤東以《西遊記》中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一唱一和。<sup>55</sup>郭沫  
若在 1948 年被中央研究院選舉為人文組第一屆院士，是大知識分子中的大知  
識分子。由郭、毛的詩歌唱和來看，明代小說和戲曲中的各式人等及其事蹟，  
毛不僅用作說服、教育、表揚和鼓動工農兵群眾的範本，而且在知識分子甚至  
大知識分子身上也一體適用。李達和張申府一樣，也是中共早期的老黨員，都  
以馬列哲學家名世，也都曾脫黨自立。所不同的是，張申府的仕途，在中共立  
國後被「冷凍」到死而李達則官運亨通。因為，李達並未如張申府那樣，在  
中共關閉和談大門後還呼籲國共停戰，而李達又與毛有舊交情，李達在中共勝利  
後主動向毛輸誠，並為自己往日的脫黨作深刻檢討。尤其重要的是，毛澤東正  
一心建立自己「革命導師」或「哲王」(philosophical king)的地位，十分需要  
馬列哲學家的奔走效勞。為了安撫和籠絡李達，毛請出了《水滸傳》中的黑旋  
風。對於李達的當面請罪和為自己昔日脫黨所表示的「遺憾」，毛表現出異乎  
尋常的寬容大度：「你遺憾什麼？你是黑旋風李達，你比他還厲害。他只有兩  
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有李達之大忠、大義、大勇，還比他多一個大智。你從

<sup>54</sup> 轉引自吳江雄編，《毛澤東談古論今》，卷上，頁 113。

<sup>55</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詩詞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 124-127。

『五四』時期，直到全國解放，都是理論界的『黑旋風』，胡適、梁啟超、張東蓀、江亢虎這些『大人物』都挨過你的『板斧』，你在理論界跟魯迅是一樣的。」<sup>56</sup>滿臉羞慚的李達，正為自己「貪生怕死」的脫黨歷史忐忑不安，誰知毛不僅不加究責，還被當場封之為「理論界的黑旋風」！試問《水滸傳》一百零八個好漢中，又有誰能比殺人如割草的黑旋風李達更為神勇？毛的賜封，徹底根治了李達的心病；而李達為報答毛的知遇之恩，也為介紹、宣傳和普及毛澤東思想卯足全力；李達在極短期間趕寫出來的一系列評介和詮釋毛澤東哲學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的文章，使他成為共和國初年全國學習毛著運動的最重要推手和理論家。但當李達在文革時被武漢大學紅衛兵揪鬥，寫信向毛乞命時，毛竟然不聞不問置之不理，任由李達備受摧殘而死。到底是因為毛的「革命導師」或「哲王」的地位，在文革時已經穩如泰山，再也用不著李達的幫閒？還是因為李達當時官拜武漢大學校長，成了毛必須鏟除的「走資派」？或是兩者兼而有之？是耶非耶，只有留待研究毛與李達關係的專家去考證了。

### 三、「除惡即行善」

當然，毛澤東對信手拈來的小說人物，在不同場合會派上不同的用場，而毛對同一人物的評價，在不同場合也有可能大不相同。但敢於大鬧天宮的孫大聖，卻一貫是毛稱道和表彰的對象。孫悟空對妖魔鬼怪的心狠手辣和除惡務盡，尤其是他那根令滿天神佛聞風喪膽的「千鈞棒」，更被毛讚嘆擊節再三，樹立為全國、全黨和全軍效法的典型。<sup>57</sup>在 1960 年代初，郭沫若觀看了有關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電影，一時技癢賦七律〈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一首：

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咒念金箍聞萬遍，精逃白骨累三

<sup>56</sup> 陳微主編，《毛澤東與文化界名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頁 66-67。

<sup>57</sup> 文革前姚文元不過是上海市委的一個小小的宣傳幹事，但卻敢於向文藝界權威人士的「資產階級思想」及其作品筆伐口誅，文藝界人人談虎色變，稱之為「棍子」而不名，但毛夫人卻譽之為「無產階級的金棍子」，而姚更被毛不次拔擢，成為協助毛暗中發動文革的幾個心腹分子之一。

遭。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聖毛。教育及時堪贊賞，猪猶智慧勝愚曹。<sup>58</sup>

毛閱後心中大不以爲然，忍不住以〈和郭沫若同志〉爲題，答詩予以繩正：

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域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sup>59</sup>

在毛看來，郭詩的根本錯誤，在於混淆「人民內部」與「敵我」之間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從毛階級鬥爭的視角，唐僧雖有許多錯誤，但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範疇，而白骨精則屬於敵我矛盾的範疇；屬於人民的唐僧，不僅不應「千刀當剮」，而應耐心教育之，爭取之，使之幡然改悔，迷途知返；而屬於階級敵人的白骨精，則是革命事業的心腹大患，故必待「奮起千鈞棒」的「金猴」一棒子打殺！郭沫若「鬥爭的矛頭」，不指向階級敵人（白骨精），而竟指向了人民（唐僧），誠「不足爲訓」也，故必須公開糾正之。

「對敵人仁慈，就是對人民殘忍。」這是毛一再向全國全黨全軍灌輸的信念，也是毛自己真誠地堅信的理念。《繪圖增像西遊記》的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義，黑松林三藏逢魔〉，其中道及孫悟空因誅殺妖魔過多，終被慈悲爲懷的唐僧逐出門牆。悟空乃重返花果山，一時凶性大發，打殺了千餘獵猴人馬，事後還鼓掌大笑口稱「快活」，並對唐僧「千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常有餘」的舊時教訓大加譏諷。毛閱後覺深獲我心，洋洋灑灑地揮筆在書頁寫下一段批語：「『千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常有餘。』鄉愿思想也。孫悟空的思想與此相反，他是不信這些的，即是說作者吳承恩不信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惡。他的除惡，即是行善。……」<sup>60</sup>順著毛「除惡即行善」的理路，他在國共內戰居於劣勢時，曾聯合民主人士發動輿論攻勢，呼籲國共和談停戰，但在內戰穩佔上風時，則把仍在呼籲和談的民主人士視爲

<sup>58</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詩詞集》，頁 127。

<sup>59</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詩詞集》，頁 124。

<sup>60</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頁 74-75。

「反動分子」，<sup>61</sup>而改唱「宜將剩勇追窮寇」，<sup>62</sup>誓言「將革命進行到底」了。<sup>63</sup>因爲，他決不肯當沽名釣譽的「鄉愿」或「霸王」，絕不會爲了搏取民主人士的幾句讚揚，冒虛名而買實禍，讓戰敗的國民黨「贏得養好創傷的機會，然後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將革命扼死，使全國回到黑暗世界」。<sup>64</sup>職是之故，他在甫得天下之時，不僅未曾去殘止殺收拾人心，反而公開宣布「人民民主專政」即「人民民主獨裁」，<sup>65</sup>宣稱對敵人「決不施仁政」！<sup>66</sup>本來，中共在奪得全國政權之初，曾信誓旦旦地一再保證：「反動黨團」分子只要向公安機關登記自首，便一定可獲得「寬大處理」；而最初出來登記自首者，也真的在登記後被獲准平安返家。但一俟絕大多數的「分子」都已登記之後，毛突然把臉一翻，公開批評了公安部長羅瑞卿的「寬大政策」，重申「寬大」不等於「寬大無邊」；對於已登記的「罪證確鑿」的反革命分子，絕不允許「既往不究」，其中該殺的還是要殺，該關的還是要關，否則不但人民不高興，甚至連耕牛農具也會不

<sup>61</sup> 中共早期老黨員，著名哲學家張申府，曾在周恩來留法時介紹周加入共黨組織，後雖脫黨自立，但仍與中共聲氣相通，講學撰文常爲中共張目，被學界視爲中共的同路人或黨外布爾什維克。當中共的宣傳口徑已從求和一變爲「將革命進行到底」時，張仍撰文呼籲國共停戰。中共立國後，張因「反動言論」被打入另冊，甚至不許在學校教書，賴周恩來照拂領文史館員薄酬過活，後半生極爲失意落寞。

<sup>62</sup> 毛澤東在共軍攻佔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時，曾賦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表示其絕不相信古人「窮寇莫追」的格言，決心徹底消滅國民黨殘餘勢力，「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其詩云：「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詩詞集》，頁 74。

<sup>63</sup> 毛澤東說：「現在擺在中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面前的問題，是將革命進到底呢，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呢？如果要使革命進到底的話，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土消滅一切反動勢力，……。」毛澤東，〈將革命進行到底〉，收入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下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頁 1266。

<sup>64</sup> 毛澤東，〈將革命進行到底〉，收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 1266。

<sup>65</sup> 毛澤東說：「『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收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 1364。

<sup>66</sup> 毛澤東說：「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對於敵對的階級，它是壓迫的工具，它是暴力，並不是什麼『仁慈』的東西。『你們不仁。』正是這樣。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爲，決不施仁政。……」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收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 1365。



高興云云。<sup>67</sup>羅瑞卿心領神會，立刻向毛作出檢討，並依照已登記的資料按圖索驥地展開大搜捕，輕而易舉地把全國的「分子」幾乎一網打盡。

毛在中共立國初年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尤其在「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這「三大運動」之中，所處決的「階級敵人」數以百萬計。<sup>68</sup>毛對自己的先背信，後殘殺，不僅沒有絲毫的不安和負疚，而且還因「除惡即行善」而心安理得，因「陽謀」得售而洋洋得意。當毛澤東和答郭沫若詩之際，正值劉少奇、鄧小平等在農村推行「三自一包」的新政，使得中國的國民經濟，逐漸克服了由毛澤東的「三面紅旗」所造成的赤地百萬里，餓殍四千萬的滔天巨禍；但毛所最關注的，並不是曾瀕臨於「餓死邊緣」的中國農民，有一部份已開始能吃上一口飽飯，而是新政可能帶來的「妖霧」，亦即讓毛後半生寢食難安的「資本主義復辟」。有鑒於此，毛決心為全國全黨全軍上緊階級鬥爭時鐘的發條。他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了資本主義有可能復辟的警訊，並強調為了確保紅色政權的永不變色，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和天天講！<sup>69</sup>毛還設想如果資本主義一旦在中央「復辟」，地方就應起來造中央的反，<sup>70</sup>像

<sup>67</sup> 毛澤東在 1951 年初親自掛帥，多次嚴令中共各地首長大殺「反革命分子」，例如他在 1951 年 1 月 17 日致饒漱石、陳毅等人電云：「傾接中南局轉來湘西四十七軍關於鎮壓反革命情況的報告，在湘西廿一縣中殺了匪首惡霸特務四千六百餘人，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一批，我以為這個處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敵焰下降，民氣大伸。如果我們優柔寡斷，則將遺禍人民，脫離群眾。……對於真正的匪首惡霸及堅決的特務分子，必須在人民擁護的基礎上，堅決地處以死刑。特別是那些土匪猖獗，惡霸甚多，特務集中的地方要大殺幾批。打得穩、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準，就是不要殺錯。打得狠，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毛澤東，〈關於對反革命必須打得穩打得準打得狠的電報〉，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67 年 7 月-10 月》，冊 2，頁 36-37。

<sup>68</sup>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修訂版）（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 570-577。

<sup>69</sup>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倡階級鬥爭的原話是「年年講、月月講」，但《紅旗》於 1967 年 10 期社論〈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的理論武器〉，在引用毛的話時改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該社論於 6 月 20 日由《人民日報》全文刊登，從此，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成了毛向全國的動員令，人人耳熟能詳。見逢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收入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頁 94-95。

<sup>70</sup> 毛澤東說：「小三線很重要。有人說分散了怕造反。我看兩條：準備化為水，不怕造反。」「我現在說造反問題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英國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於美國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毛在講了一大段漢、唐、宋、明的歷史後，接著說：「如果中央搞得不對，所謂不對，不是講小不對，而是講大的不對。如果出了



孫行者一樣來個大鬧天宮。<sup>71</sup>這就是毛詩「今日歡呼孫大聖」的緣由。毛澤東果然在不久後發動了文革，而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也果然成立了無數的像「金猴」、「孫大聖」、「孫行者」、「孫悟空」、「千鈞棒」的戰鬥隊，跟隨著毛澤東一起大鬧天宮，揪鬥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中共高、中層級的幹部，幾乎無一倖免。紅衛兵億萬根「金箍棒」，更「橫掃」了社會上的一切「牛鬼蛇神」或「階級敵人」，在抄家、搶掠、打人、殺人和搗毀廟宇、破壞文物的紅色恐怖之中，把整個中國大陸弄得生靈塗炭鬼哭神嚎天翻地覆。

#### 四、「使人改過自效」

中國的儒、道、釋三大教派，都無不相信人皆可改過遷善。儒家強調人可通過修養成爲聖人，道家強調人可通過修養成爲真人，釋家強調人可通過修養成爲佛祖或菩薩。承認並強調人的可塑性或可改造性，是中國傳統文化最核心的成分之一。毛澤東在確信有殺人的必要時，便會強調「除惡即行善」，殺起人來決不會絲毫心慈手軟。但他並不專靠肉體的毀滅來解決問題，在可殺可不殺，尤其是在不必擅殺之時，毛則寧願「刀下留人」，並把保住首領的人，設法予以利用和「改造」。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對毛的影響，也是毛所領導的政黨與斯大林領導的政黨，在懲處「階級敵人」之時最大的不同之處。毛在中國的刑法系統中，創造了「死緩」的等級，安插在「死刑」與「無期徒刑」之間，並把十分之八九本來要處死的犯人暫時不殺，並以兩年的苦役爲期，讓在「勞動改造」中表現良好者改判「無期徒刑」，表現不好者則依舊執行死刑。<sup>72</sup>由求生的意志所挑激起的拚命勞動，迄今仍爲中共的監獄系統創造著巨大的經濟

---

赫魯曉夫，那有小三線就好造反。中國人好造反，我們這些人還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冊下，頁 1395。

<sup>71</sup> 毛澤東在文革前夕鼓吹地方起來「造反」的大量言論，詳見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冊下，頁 1388-1432。

<sup>72</sup> 毛澤東，〈鎮壓反革命必須打得穩，打得準，打得狠〉，收入《毛澤東選集》，卷 5，頁 43-44。

收益。<sup>73</sup>毛的監獄系統不僅具有懲罰性的功能，而且還具有教化的功能。所謂懲罰，就是通過關禁，讓犯人爲自己罪行付出代價；所謂教化，就是強迫犯人參加勞動，並通過勞動，把犯人由壞人改造爲好人。正因如此，毛又把坐牢稱之爲「勞動改造」或「勞改」。明人馮夢龍所編纂的《智囊》卷三的〈上智部·通簡·程明道〉條，有這麼一段記載：「明道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境無焚舟之患。」毛讀到此段心領神會，畫龍點睛地揮筆寫下了「勞動改造」這四個字的批語。<sup>74</sup>

對於如何發掘和掌握別人的缺失、錯誤或罪過，並以此爲把柄，脅持別人服從自己的意志和指令，毛澤東正是深諳此道的大行家。《智囊》卷三的〈上智部·通簡·朱博〉條寫道：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sup>75</sup>

毛澤東讀到朱博遽殺此吏，忍不住在書頁上寫了一段批語：「此吏亦可不殺，教以改過，調改他職可也。」<sup>76</sup>在毛看來，朱博既已安然過關，又掌握了此吏「教民聚會」包圍長官的罪證，正好以此脅持，使其帖耳俯首爲自己效力，殺之未免太過浪費。如果朱博的故事到此爲止，毛泰半會以短智之武人莽夫視之，幸而《智囊》還有下文，讓毛根本改變自己對朱博的看法。其文云：

<sup>73</sup> 毛澤東一再強調，改判「死緩」可「保存了大批的勞動力」。毛澤東，〈鎮壓反革命必須打得穩，打得準，打得狠〉，收入《毛澤東選集》，卷5，頁43-44。

<sup>74</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頁55。

<sup>75</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頁53。

<sup>76</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頁53。

博為左馮翊，有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耻，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一錢以上，無得有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且自疏奸贓，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撥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sup>77</sup>

毛在書頁的批語是：「使人改過自效」。<sup>78</sup>朱博以尚方禁的婚外情（「嘗盜人妻」）為突破口，脅迫尚方禁成為自己的線民（「以為耳目」），而尚方禁因朱博答允代為保密，又許其戴罪立功，於是只有死心塌地為朱博搜集情報。毛手下大將高崗、陳再道、黃永勝等都有「寡人之疾」而性好漁色，毛也都在充分掌握其把柄之後代為守秘並擢以高位。高為東北局第一書記、陳為武漢軍區司令、黃為廣州軍區司令，三人的升遷反而比其他未患「寡人之疾」的同袍更為快捷。箇中道理，說明了愈是有罪過為毛所掌握，就愈易為毛所親信，就如同朱博親信尚方禁一樣。

此外，毛對付其部屬的手法，和朱博對付受賄的功曹的手法尤其神似。朱博以功曹曾收受尚方禁的賄賂，逼令功曹把其一生中所有受賄的大事小事和盤托出，若敢「欺謾半言，斷頭矣」！這和毛澤東一以貫之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宣導，何其相似乃爾！所不同的是，朱博在收到功曹的供狀之後，立即當著功曹之面銷毀之，並「遣出就職」以示寬大；而毛則在長達三年的延安整風和審幹期間，有組織有計畫地逼迫幾乎所有的高級、中級和下級幹部，人

<sup>77</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頁 53-54。

<sup>78</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頁 54。

人「脫褲子，割尾巴」，「下水洗澡」和「引火燒身」，把包括自己祖宗三代在內的個人詳盡歷史，以及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言行，鉅細靡遺地向黨徹底坦白交代。<sup>79</sup>共和國建立之初，毛又把延安整風和審幹的經驗和模式，通過思想改造運動變本加厲地應用到全國所有幹部和知識分子身上。<sup>80</sup>對於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張聞天、王明、博古等中共巨頭，毛若認為他們「犯了錯誤」，也一樣責令撰寫「坦白」、「檢查」和「交代」。但毛並不把他們所撰寫的「坦白」、「檢查」和「交代」當面銷毀之以示寬大，而是和全國其他幹部一樣，一律立案存底。若毛與之情好日密，這些材料便會石沉大海波瀾不興；但毛與之翻臉，這些材料一經拋出，便立刻變成了「秋後算賬」時必勝必殺的「血滴子」。毛澤東在清算高崗，清算彭德懷、張聞天，或清算劉少奇、鄧小平之時，這些「血滴子」都曾威力萬鈞應驗如響。這就是為什麼中共高幹中再桀驁不馴的草莽梟雄，來到毛澤東面前，也只能戰戰兢兢俯首帖耳唯命是從。

「使人改過自效」同是毛與朱博駕馭部屬的鎮山法寶，但朱博是「威」與「德」兼施，「嚴」和「寬」並濟，故其部屬所誓言的「必死」效忠，應存有某些感激和自願的成份。而在毛方面，則只見「威」與「嚴」，「寬」是極有限的，「德」更是完全欠奉。那些被允許「改過自效」的部屬，對毛的恭順和服從，與其說是出於感激和自願，還不如說是出於既有把柄掌握在毛手中，而自身又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恐懼和無奈，出於一種類似於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的連鎖反應。當然，毛的「使人改過自效」，和斯大林動輒使用大審判(Show Trial)或行刑隊(Firing Squad)對付「犯錯誤」的老布爾什維克相比，如果還不能算是「寬大」和「仁道」得多的話，至少也是厲害得多、

<sup>79</sup> 詳參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以及翟志成，〈中共與黨內知識分子關係的四變，1921-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期23（下）（1994年6月），頁195-236。

<sup>80</sup> 參見楊絳，《洗澡》（香港：三聯書局，1988）；翟志成，〈馮友蘭的抉擇及其轉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台北），期20（2002年3月），頁447-510。

高明得多和有效得多了。正因如此，毛對這個一貫「只知殺頭」的蘇聯老大哥，心中還真有一點瞧不起。正因為以斯大林為鑑，毛在延安整風審幹期間，雖把絕大部份幹部整得死去活來，個個精神上被剝了幾層皮，<sup>81</sup>但總算勉強守住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底線。<sup>82</sup>延安整風審幹之後，數以十萬計急於「改過自效」的幹部隊伍，成了毛澤東手中賴以扳倒「舊世界」的鋼鐵槓桿。<sup>83</sup>憑著這根力能倒海移山的鋼鐵槓桿，毛澤東在國共內戰中只用了三年多一點的時間，便扳倒了無論在經濟、軍事和政治力量方面都要比自己強大得多的蔣中正，贏得了整個中國大陸。

由於吃足了延安整風審幹的甜頭，毛在日後套用延安經驗時，最常強調的是「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所謂「思想批判從嚴」，就是猛烈批判攻擊，動輒上綱上線，逼令對方徹底坦白檢討，承認重得可怕的罪名。例如逼迫王明、博古、凱豐、張聞天等承認曾主持過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逼迫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等承認曾組織過「反黨的軍事俱樂部」……等等。所謂「組織處理從寬」，就是「賞飯吃」和「給出路」，讓上述人等在悔罪認錯之後，仍可擔任中共的政治局委員或中央委員。毛一再強調：「對犯錯誤的同志總是要給他出路，要准許改正錯誤。不要認為別人犯了錯誤，就不許他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團結」，<sup>84</sup>「不要使人毫無出路」。<sup>85</sup>毛還說過：「關於犯錯誤的同志，我想只有兩條：一條，他本人願意革命；再一條，別人也要准許他繼續革命。……我們不要當《阿 Q 正傳》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 Q 革命；

<sup>81</sup> 有關延安整風審幹對中共幹部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摧殘，詳參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以及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sup>82</sup> 毛澤東說：「我們在延安就規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捉。隨便殺人沒有手續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講也得講。我們還是應該重證據，重旁證，不要重口供。」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冊下，頁 1516。

<sup>83</sup> 翟志成，〈中共與黨內知識分子關係之四變，1921-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期 23（下），頁 195-236。

<sup>84</sup>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冊下，頁 1431。

<sup>85</sup>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冊下，頁 1516。

也不要當《水滸傳》上的白衣秀士王倫，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結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高崗不准人家革命，……結果還不是把自己的命革掉了？」<sup>86</sup>一句話，「給出路」，就可「使人改過自效」；若「使人毫無出路」或「不准革命」，則會「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 五、「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毛在中共八七會議上所提出的重要建言。<sup>87</sup>會議之後，毛通過身體力行此一建言，因而改變了整個中國的命運，以及近代史發展的大方向。共和國的天下，是靠毛澤東領導共軍用槍桿子打下來的。在後毛澤東時代，毛已走下神壇由上帝變為凡人，對毛的各種批判也因之風起雲湧。但即使在「非毛澤東化」和「去毛澤東化」已成為時尚的今時今日，卻極少有人敢於批評，否定或抹煞作為軍事家的毛澤東。毛的軍事思想及其兵法，很可能是毛留給中國歷史文化唯一的正面遺產。

中共革命勝利的關鍵，除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之外，還須加上「農村包圍城市」。這兩條改變當代中國命運的重大原則，都由毛澤東首創並以廿多年的生命付之踐履。而毛這兩條克敵制勝的原則，主要並不來自馬、恩、列、斯的經典，而是來自兒時閱讀「舊小說」和觀看傳統戲劇所得的靈感。毛特別愛看的明代小說《西遊記》和《水滸傳》，讓毛自幼即對「造反」充滿了浪漫的想像與憧憬。國民黨清黨的屠殺，使得城市中的共產黨徒，成為刀俎上任人宰割的魚肉。「逼急了上山當草寇，一把火燒得滿城愁。」《打漁殺家》中的唱辭，想必在毛心中引起過巨大的回響。《水滸傳》裡一百零八個好漢在水泊

<sup>86</sup> 毛澤東，〈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收入《毛澤東選集》，卷5，頁207。

<sup>87</sup> 1927年8月7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集的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並在會上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主張。毛的原話是：「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中共中央八七會議記錄〉，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146。



梁山的聚義廳前，豎立起「替天行道」的杏黃旗，打家劫舍，官兵奈何不得的種種英雄事跡，更讓毛神往不已。「逼上梁山」便成了滿腦子都是「造反」思想的毛澤東再自然不過的抉擇。<sup>88</sup>既然蔣介石已「佔京為王」，他便決心要「佔山為王」。<sup>89</sup>毛以「我要上山交綠林朋友」為理由，辭謝了瞿秋白要他留在上海中央機關工作的邀約。<sup>90</sup>他在湖南發動了秋收暴動之後，又拒不執行湖南省委圍攻長沙的計畫，率領暴動的隊伍開往國民黨勢力薄弱的井崗山區，<sup>91</sup>實行「佔山為王」的大計。他對追隨者解釋道：歷代都有「山大王」。「山大王」憑藉山勢，官兵總是沒有辦法消滅他。如果說我們也要當「山大王」，那麼這個「山大王」是從未有過的「山大王」，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主義、有政策、有辦法、鬧革命的「山大王」。我們不是不想要長沙，而是現在我們的力量太弱，打不了長沙。中國地方大，政治不統一，經濟不平衡，我們要找敵人勢力最薄弱的地方去站住腳根。井崗山就是敵人勢力最薄弱的地方。<sup>92</sup>

爲了在井崗山站住腳跟，毛簡直演活了《水滸傳》中的宋江。當時井崗山盤據著兩股綠林武裝，分別爲袁文才和王佐這兩個山大王統領。毛深知強龍不壓地頭蛇的道理，若無袁、王的允許及協助，自己所率領的外鄉人隊伍，絕不可能在以客家籍居民爲主體的井崗山區立足生根。於是，毛只帶著幾個隨從，分別到袁、王的巢穴登門拜候，活像宋江一樣禮賢下士誠意十足。毛偵知袁、王視槍如命，一出手即送袁槍一百條、王槍七十條，其數量甚至超過袁、王擁槍的總數，如此的「仗義疏槍」，其豪氣又壓倒了只會「仗義疏財」的宋江。至於毛「劫富濟貧」的面諛，「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許諾，恐怕與逢人就

<sup>88</sup> 中共建國後，毛澤東曾多次向外賓談及他的被逼上梁山：「像我這樣一個人，從前並不會打仗，甚至連想也沒有想到過要打仗，可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強迫我拿起武器。」「是什麼原因使我到軍隊中去的？還是帝國主義、蔣介石的殺人。」轉引自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頁 149。

<sup>89</sup> 葉永烈，《毛澤東之初》（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頁 119。

<sup>90</sup> 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頁 147。

<sup>91</sup> 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頁 158。

<sup>92</sup> 葉永烈，《毛澤東之初》，頁 119。

稱哥哥的宋江不相伯仲。<sup>93</sup>要籠絡綠林豪傑，必須熟悉其言語、價值觀和行為模式，毛澤東對《水滸傳》的熟極而流和活學活用，使他贏得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充分好感和信賴，進而贏得了在井崗山生存和發展的空間。而井崗山也以毛建立的第一個山寨或「紅色根據地」，而被載入了中共革命的史冊。

「造反」究其實是毛澤東終身的鄉愁。毛在兒時造父親的反，在學校時造老師的反，在野時造國民黨政府的反，在下位時造上級的反，自己坐了龍庭實在無反可造了，竟然帶領紅衛兵造自己政權的反。<sup>94</sup>作為永遠的造反派，毛甚至把梁山好漢風高放火，月黑殺人，大秤分銀，小秤分金的造反傳奇，提昇到馬克思和社會主義的理論高度。毛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鬥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sup>95</sup>毛這段「造反有理」的名言，在文革時還被譜成了語錄歌，唱遍了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千百萬紅衛兵和造反派，就是在「造反有理」的戰歌聲中，把毛在「佔山為王」期間倖存的老兄弟，亦即毛口中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幾乎全部鬥垮，鬥倒，鬥臭！

不過，毛在「佔山為王」時，造反是要殺頭的。為保住自己的首領，毛和歷代的造反者一樣，必須拿起刀槍作殊死的拚鬥。毛從來沒有上過軍校，但卻能成功地指揮著他的赤色造反大軍南征北戰，聲東擊西，以小吃大，反弱為強，讓那些出身於美國、德國、日本、保定、黃埔軍校的國民黨職業軍官，一個個都成為他的手下敗將或階下囚。毛澤東的用兵如神算無遺策，所仰仗的「武林秘笈」，竟然泰半又是明代的舊小說。當時中共有某領導譏諷毛不懂現代軍事理論，打仗只能依靠《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其實，毛當時連《孫子兵

<sup>93</sup>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頁166-173。

<sup>94</sup> 毛澤東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冊下，頁1406。

<sup>95</sup> 這段話首聞於毛在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演說，其後在1949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公開正式發表。

法》都還未曾翻過，<sup>96</sup>《三國演義》千真萬確是他的第一部軍事教科書。以現有的資料判斷，毛的另外兩部軍事教科書應是《水滸傳》，再加上以後惡補的《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是一部貨真價實的「相斫」書，其中曹操、周瑜、司馬懿和諸葛孔明等大軍事家之間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戰爭博奕，當然能讓毛在形成和反思自己戰略與戰術時，吸取無窮無盡的經驗、智慧和教訓，激發無限豐富的想像與靈感。即使《水滸傳》這部被孫述宇教授稱之為「強人寫給強人閱讀的教科書」，其中一些關於梁山好漢個人搏擊或集團征討的故事，也為毛所吸收和借鑑，構成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份。例如，他從林冲和洪教頭在柴進的莊園中單挑，林在洪來勢洶洶的攻擊中，故意佯敗後退以窺測對手的破綻，結果「一腳踢翻了洪教頭」的故事，總結出敵我「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後發制人，因則戰勝」的戰略和戰術通則。<sup>97</sup>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第五章「戰略防禦」中寫道：

戰略退卻的目的是為了保存軍力，準備反攻。退卻之所以必要，是因為處在強敵的進攻面前，若不退讓一步，則必危及軍力的保存。過去卻有許多人堅決地反對退卻，認為這是「機會主義的單純防禦路線」。我們的歷史已經證明這個反對是完全錯誤的了。<sup>98</sup>

毛從敵強我弱時有計畫的戰略退卻中，總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口訣，並把這十六字口訣變為游擊戰中克敵制勝的殺手鐮。當強大的國民黨軍進攻毛的根據地時，毛便讓開大門引誘國軍深入，並把弱小的紅軍「化整為零」，讓國軍找不到作戰的目標。如此一來國軍勢必分兵四出搜索，而毛等到國軍因分兵露出致命的破綻之後，便把分散的部隊迅速

<sup>96</sup> 據黃允升在文章中透露：「在 60 年代，毛澤東曾多次這樣談及：當時黨內有同志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能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並沒有。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麼？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後，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孫子兵法》。」黃允升，〈《遵義會議紀實》若干史實辨正〉，《中共黨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頁 89-91。

<sup>97</sup>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收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 188-189。

<sup>98</sup>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收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 190。

集結，來個「化零為整」，往往以五到六倍的壓倒性的優勢兵力，在各個地區把分散的國軍部隊先後圍殲。<sup>99</sup>通過誘敵深入的戰略退卻，毛把整體戰場上共軍與國軍兵力對比的絕對劣勢，一變為局部戰區兵力對比的絕對優勢。當毛集中了絕對優勢的兵力在局部戰區逐次圍殲敵軍之後，共軍與國軍在整體場上兵力的對比也逐漸產生了改變。共軍在整體戰場上兵力也開始佔據了優勢，一俟優勢繼續擴大，毛便會不失時機地與國軍進行主力決戰，並在決戰中徹底擊敗對手。1930年代毛在中央蘇區成功地挫敗了國軍的第一至第四次的大圍剿，所使用的正是此一戰法。中共隨後在國軍的第五次大圍剿中慘遭敗績並丟失了中央蘇區，正是因為剝奪了毛的兵權，摒棄了毛「誘敵深入」的戰法，企圖「禦敵於國門之外」，集中兵力和強敵在陣地戰中硬拚。而彭德懷在1940年代後期以不足三萬的兵力，擊破了胡宗南進犯延安的十數萬大軍，所援用的還是毛的戰法。

除了從林冲的佯敗悟出游擊戰必殺必勝的律則之外，毛還從《水滸傳》的「三打祝家莊」中，印證了偵察、用間和設伏這個三面的統籌和活用，會對決定戰爭的成敗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毛說：

孫子論軍事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他說的是作戰的雙方。唐朝人魏徵說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對。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帶片面性。這樣的人就往往碰釘子。《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後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於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並且佈置了藏在敵人營盤裡的伏兵，用了和

<sup>99</sup> 《智囊》卷二十二的〈兵智部·制勝·孫臏〉條云：「唐太宗嘗言：『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陣，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過數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陣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蓋用孫子之術也。宋高宗問吳璘以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亦曰：『此孫臏駟馬之法。』」毛批注此條云：「所謂以弱當強，就是以少數兵力佯攻敵諸路大軍。所謂以強當弱，就是集中絕對優勢兵力，以五六倍於敵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圍，聚而殲之。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的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頁65-66。

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sup>100</sup>至於毛如何在國民黨的黨、政、軍、特務系統，以及在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如陳儀、胡宗南、傅作義、白崇禧、衛立煌、杜聿明、盧漢等人身邊，大都安排了得力間諜刺探情報，使自己對國民黨的經濟、政治尤其是軍事動向瞭如指掌；毛如何千方百計利用、挑撥和強化國民黨黨、政、軍、特務系統之間，中央與地方實力派如桂系、粵系、川系、滇系之間，中央軍與雜牌軍之間的各種矛盾，使其勾心鬥角，爭功諉過，幸災樂禍和見死不救，以利於中共一拉一打，各個擊破，時下學界和文化界已有太多的著墨，篇幅所限毋庸細表。但毛澤東克敵制勝的靈感，大都來自明代《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等小說，時下學界和文化界對此卻著墨不多，故值得特別記上一筆。

## 餘 論

在文革時期，最常見的景觀之一，應該是紅衛兵、造反派或革命群眾高擊著「紅彤彤的寶書」（毛語錄），在大庭廣眾之中捕捉、審訊、遊鬥和毆辱「走資派」。對明代歷史文化稍有常識的人，目睹此一文革景觀，都難免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因為，明代的民眾也曾高擊著朱元璋的語錄或《大誥》，捉拿由布政司到府、州、縣的「在役」或「在閑」之官吏。隨便翻檢《大誥》，便蒐得以下兩則：

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在閑之吏，城市鄉村老奸巨猾頑民，專一起滅詞訟，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間者，許城市鄉村賢良方正、豪傑之士，有能為民除患者，合議城市鄉村，將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閑之吏，幫縛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當者，梟。令拿赴京之時，關津渡口毋得阻當。<sup>101</sup>

<sup>100</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著作選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冊下，頁 800-801。

<sup>101</sup> 張德信、毛佩琦主編，《洪武御制全書·鄉民除患第五十九》（合肥：黃山書社，1995），頁 776。



前者《大誥》一出，民有從吾命者。惟常熟縣陳壽六為縣吏顧英所害，非止害己，害民甚眾。其陳壽六率弟與甥三人擒其吏，執《大誥》赴京面奏。朕嘉其能，賞鈔二十錠，三人衣各二件。更敕都察院榜諭市村，其陳壽六與免雜泛差役三年，敢有羅織生事擾害者，族誅。若陳壽六因而倚恃，凌辱鄉里者，罪亦不赦。設有捏詞誣陷陳壽六者，亦族誅。陳壽六倘有過失，不許擅勾，以狀來聞，然後京師差人宣至，朕親問其由。其陳壽六豈不偉歟！<sup>102</sup>

朱皇帝的文化程度不高，以致朱語錄（《大誥》）以「幫」作「綁」，以「當」作「擋」，錯字白字連篇，與毛皇帝的文彩風流相比，洵有泥雲之判。但朱元璋在約六百年前，便已有了藉群眾集會進行鬥爭、公審、遊街、扭送等新發明，有了以自己的「語錄」踐踏司法、侵犯人身的大創造。這和「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直接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操弄的紅衛兵的「革命行動」，何其相似乃爾！也許有人要問：藉群眾集會進行鬥爭、公審、遊街、扭送等行徑，其實在中共早期革命，比如國共合作時期，北伐時期的農民運動，以及國共分裂後在鄂豫皖蘇區、湘鄂西以及其他蘇區，彭湃發動的農民運動，都有類似的情況；在希特勒與斯大林統治的國度，也有此場面；為什麼不把文革與之直接聯繫起來，而偏要扯上六百年前的朱元璋？答曰：在希特勒、斯大林或中共早期領袖如彭湃等人當政之時，我們還未發現有任何案例，以證明當時確有群眾高舉過希特勒、斯大林或彭湃的著作，或類似於《大誥》和《紅寶書》，作為自己凌駕和踐踏法制，侵犯人身的護符。正因如此，文革中紅衛兵高舉《紅寶書》霸凌法制和洪武年間民眾高舉《大誥》霸凌律法，六百年來確係只此兩家，更無其他。當然，由於文獻不足徵，我們至今還不能斷言毛在文革中諸如此類的「偉大發明創造」，都是直接師法朱元璋的故智——儘管我們有著充分的理由高度地予以懷疑。

毛澤東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吸取和應用，當然不會僅僅侷限於有明一代。例

<sup>102</sup> 張德信、毛佩琦主編，《洪武御制全書·如誥擒惡受賞第十》，頁 802。

如清朝曹雪芹的《紅樓夢》、曾國藩的文治武功，對毛思想都產生過重要的影響。關於這一點，我們認為不僅應予以充分承認，而且還必須高度正視。但任何人都不能一口吸盡西江之水，要充分析論毛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吸取和應用這一課題，必須要有多篇論文甚至多本專書的合力。本文的論旨，端在闡析明代的歷史文化，經由毛澤東創造性的轉化之後，已變為毛打天下、治天下或亂天下的重要思想資源。毛的不少方針政策，有些直接緣自毛閱讀與明代相關典籍的心得，有些則經過與毛的閱讀心得互相對照、互相發明或互相批判，從而得到更新、修正或強化。並且，毛對明代小說、戲曲的熟習和靈活應用，使他如魚得水般自由出入於大眾文化和菁英文化、大傳統和小傳統之間，而他在這兩種文化和兩個傳統之間左右逢源的能耐，又使他成為操弄群眾感情的心理工程大師。他在閱讀《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所領悟出的戰略和戰術，更幫助他在戰場上擊敗了國民黨，贏得了整個中國大陸。

## Mao Zedong's Use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Chak Chi-shing<sup>\*</sup>

### Abstract

Mao Zedong's us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was obviously not confined to the Ming Dynasty. For example, *The Story of the Stone* by Cao Xueqin and *Statecraft* by Zeng Guofan of the Qing Dynasty had profound influence on Mao's thinking. To fully analyze Mao's use of the entire extent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would require volumes, but this article can focus on Mao's use of the Ming Dynasty. Inspired by Zhang Xuecheng's concept that "the Six Classics are all history," this article not only considers materials written and edite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t also includes Qing and modern texts on the M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how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after being creatively transformed by Mao, were used as important sources of Mao's thinking. Many of Mao's policies were influenced by his readings of Ming Dynasty works. In addition, Mao's familiarity with drama and fic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enabled him to move freely between popular culture and elite culture. This contributed to his mastery of psychological engineering and mass mobilization. Furthermore, Mao's reading of *The Water Margin* and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llowed him to devise tactics to defeat the Nationalist Party in 1949.

**Keywords: Mao Zedo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pular culture, mass mobilization, psychological engineering**

---

\* Departmen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